

我的学术小传

胡福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艰苦求学 20 年 / 6

一 / 8

我的童年是贫穷而快乐的。

日本鬼子抢粮和抓共产党人这两件事告诉我，家乡的农民是爱国的，共命运的，可爱可敬的。

二 / 14

开春刚刚过了年，邮差送来一封信，是无锡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春季班二班。父亲坚持让我读书，他一心想让我当个小学老师。

三 / 17

1955 年初夏，国务院发出通知，号召党、政、群机关的年轻知识分子报考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我突然做起了大学梦。

当大巴车通过天安门前，我仰望着天安门城楼、凝视着毛主席像，心潮澎湃，我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能读北京大学，是全村一百多户第一个。

第二章 艰难任教 20 年 / 32

一 / 34

1962 年 12 月下旬,我到南京大学报到,在政治系当助教。

我常去学生宿舍,回答学生提问或由我向学生提问,互相讨论。同学们到栖霞山农村劳动,我也同去。他们至多比我小 10 岁,可说是同龄人。

二 / 41

学校的命运、个人的命运是由大形势决定的。个人选择的余地很小。一次无准备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命运。

三 / 59

1971 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和妻子张丽华都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说晚上七点在大礼堂召开党员大会,并且每人发一张入场券,说明要凭券入场。会议似乎很神秘……

四 / 65

在个人崇拜盛行、全面专政的年代,全国有南京等多个城市爆发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只能用人心向背来解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三章 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80

一 / 82

我在寻找的阻挠我国发展的根本问题、阻挠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批判、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就是总开关。想清这一点,我很兴奋。

找到了“两个凡是”否定真理的实践标准这个根本错误后,我就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题目,把“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论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

二 / 94

1977年8月下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写成了,约八千字,稿子寄到哪里去呢?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同志。

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先是介绍了我和孙长江同志,并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讨论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原本要在4月2日的哲学副刊发表了,我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发表,但是要修改。

三 / 1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乎党心、民心。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倍感亲切,反复读了多遍公报,过了一年半载还要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四 / 130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担当,要有责任感、使命感。

第四章 到省级机关工作 / 142

一 / 144

江苏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委宣传部报到。两天后,我到宣传部报到,当时就给我安排了办公室。

当时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很繁忙、复杂。

二 / 150

江苏省委决定,调我到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担任校长,从事干部教育工作。这跟我的教师出身比较吻合。

我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后,一直重视乡镇企业,经常到苏南地区调查乡镇企业。我到省委党校工作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

三 / 158

1995年,我转到江苏省政协担任副主席,开始了新的学习和新的工作。

做好政协工作,归根到底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第二,切实地发扬民主,并把民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成果落实到实践中,见实效;第三,政协委员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职能,事先做好调查研究,倾听所联系界别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建诤言,献良策。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166

附录 / 17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17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187

前 言

这本书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胡福明卷》中的学术小传扩充而成。

在胡耀邦同志的组织和推动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遭到了中央宣传部门主要负责人的严厉指责。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严厉批评了照抄照搬上级指示的错误态度,由此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以后,我应邀到省内外多个单位做了介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报告。主要是声明这篇文章写作过程、内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它的意义。在讲解完以后,经常有同志提出问题:你是怎么能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你是怎么知道要批判“两个凡是”的?是谁给你的指示?能不能给我一点内部消息,透露一点秘密?可我确实没有内部消息,没有任何领导人的提示,我告诉他们真的没有。我是贫苦农民出身,那时家里最大的官是我二哥,当了副乡长;我认识的最大的官是匡亚明校长,他当时还没有“解放”,关在“牛棚”里面。我的文章并没有幕后指挥,使他们很失望。这个

问题我确实无法给出令他们满意的答案。

我是在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去排除思想上的障碍。我发现 1977 年 2 月 7 日两报一刊的《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有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幌子，首先是阻挠为邓小平平反、阻挠为 1976 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了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我认定，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就是用“两个凡是”来阻止拨乱反正的。“两个凡是”就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是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因为“两个凡是”认为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指示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理，不会有错，因此提出要始终遵守“两个凡是”。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是迷信和盲从。这就是“两个凡是”的本质。只有破除“两个凡是”，揭露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本质，否定“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破除个人崇拜和迷信盲从，才能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怎样批判“两个凡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我把这个作为文章的中

心思想。于是,这就引出了文章的主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党的方针政策,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理;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就需要改正。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都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凡是实践检验正确的,都坚持;凡是实践检验不完备的、错误的,则改正。他们都是自觉地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三部分,林彪、“四人帮”鼓吹“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周扬同志在全国哲学讨论会上说过“科学无禁区”,我提出“有禁区的地方就不是科学,只有迷信和盲从”。

至于人家问,你怎么有能力写出这篇文章的?你怎么敢于批判两报一刊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这个问题就更难回答了,我只能用我的生平来回答。我是共产党培养的,是人民养育、人民教育的,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开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研究班,我就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志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到南大工作以后,到海安曲塘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无锡钱桥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革”中经受了强烈的打击、迫害,受到了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南京人民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3·29革命运动的教育,受到了1976年清明节天

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革命运动的教育，这才产生了必须否定“文革”、否定“天才论”、否定“四人帮”的强烈愿望。是党和人民给了我斗争的勇气，也给了我武器——马克思主义，还给了我必胜的信心。人民已经觉醒了，人民要求解放。这也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有它的时代特征，也都有它的国情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的英法德，它是以德国法国的工人运动为基础的。列宁主义产生于帝国主义时代，是在封建的落后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是首要的敌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但是队伍小，人数少。中国绝大多数是农民，占人口的近百分之九十，农民中贫下中农雇工又占绝大多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他们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两面性。因此，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农民、小资产者为主力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以，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征，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以及政治路线，根本上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思想展开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只能从中国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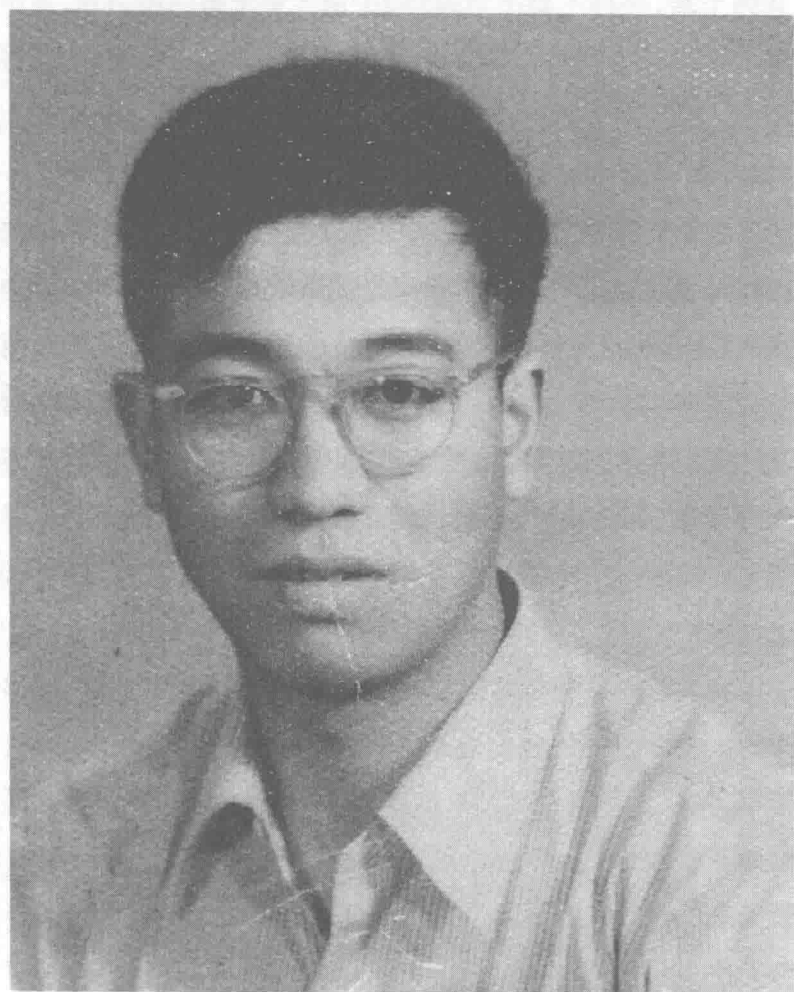
出发,从时代特征出发,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二个伟大成果,其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根本,从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开始,反腐倡廉,深得党心民心。随后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伟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了系统阐述,随后在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上进一步具体化,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国际战略、外交新局面,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虽已年老,视力严重下降,但脑子还清醒,因此仍在家人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力求跟上时代的步伐。

这部小传在整理和补充的过程中,得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唐正东教授的研究生焦一达同学的帮助。

第一章

艰苦求学 20 年



—

我是江苏省无锡县人，家住长安乡胡巷村，于1935年农历六月十九日正午出生。我家世代务农，1949年解放时，全家八口人，有自田三亩六分，租田一亩五分，冬春两季用米糠与大米和着煮饭；夏秋两季用麸皮、青菜、南瓜等和着面粉吃。我们兄弟姊妹共十一人。前面的母亲生育三男两女，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从小就送给亲戚家了。我母亲生育四男两女。我的一个弟弟送给亲戚做养子；两个弟弟小时患病，无钱医治，都死了。两个妹妹是解放后出生的，都健在。

我的童年是贫穷而快乐的。江南的冬天天气晴朗，暖洋洋的。小学放学后我们总拿着篮子、镰刀和铲子去割羊草、猪草、芥菜、苜蓿（无锡话叫金花菜，不仅可以喂猪喂羊，也可以炒着给人吃）。割满了一篮子，我们一群孩子就玩游戏。秋天水稻收割以后，种麦子时，会在田头留一块地，等到来年春天挖一个粪池，放猪牛羊和人的粪便，和草混在一起，沤肥用。冬天时，这块稻田还是原样，我们在这块地上挖个小坑，在两三丈远的地方画一条线。大家站在线外把小铲子往小坑里投，谁投进谁赢，赢者能把输者割的草拿走。输了的没

有草不好意思回家，就向赢了的孩子借草，第二天再还。有时割完了草，天还早，就在田边太阳下面睡一会儿。小孩子调皮，就往别的孩子身上撒土，与邻村小孩子打架、拿土块互相扔。如果哪一方有大人来，另一方就会逃回自己村子。晚上大家就在月光下做游戏，老鹰捉小鸡。

解放以后办冬学，主要是面向成年村民宣传党的政策，教唱革命歌曲。我去过县里的冬训班，于是就回村里教他们唱歌。不久以后，冬学升级，办农村剧团，中学也办了个剧团，而且还有歌舞，《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等被搬上舞台。我是乡团委的组织委员，被选为村剧团的团长。我没有参加过唱歌跳舞，但我是组织者，做一些服务工作。我自己琢磨出了怎么样一个人就可以拉两块台幕，还帮剧团筹钱，购置服装、乐器，做些夜宵给大家吃。



与母亲及兄妹

我于1941年正月到胡巷小学读书,称“半年级”,半年后才升一年级。妈妈送我上学,我穿了新棉袄、新鞋子。在小学读书时,有三件事一直牢记着。第一件事,194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在校内听说日本鬼子来抢粮了,把我家囤在屋里的稻谷抢了。我急得跑回家去,只见几个鬼子端着枪站在场头,一个翻译指挥几个村民刨我家的稻谷,然后有村民挑起稻谷送到村后大河边的船上去,苏南都是用木船运粮。一会儿,我家的稻谷全刨完了。全家急得直哭,我们要饿肚子了。正哭着,十几个乡亲挑着满箩筐的稻谷送到了我家。他们告诉我们:“这次鬼子还抄了后面两家大户,我们把你们家的稻谷都放到别人家寄存了,那两家大户的粮食被抢走了。”真是绝处逢生啊!我们全家感谢救命恩人。第二件事,我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交不出学费不能上五年级。我父亲对校长说:收了稻谷后,一年学费全交清,希望让我升五年级,可校长不答应。我只能失学在家,帮父亲种田。空闲时,我抱着弟弟跑到学校墙外,听老师讲课和同学读书。有一次父亲在学校旁边找到我,十分生气,打了我一巴掌。我没哭,父亲却流泪了。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打我。秋收后我家交清了拖欠的学费。随后我又复读四年级第二学期。失学半年,虽有损失,但是认识到读书的宝贵,增强了学习的自觉性,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五年级第二学期,我参加全区小学数学竞赛,获得第二名,学校获得了一张“优胜纪念”奖状,我获得的奖品是一本《四则应用题习题解》。我在晚

上,天天自学这本书。这本书跟我初中三年、无锡师范三年,带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就不知去向了。第三件事,日本鬼子投降前一年,一天中午放学时,突然见到一群伪军绑着一个人向我家所在一排人家冲过去,后面跟着一队日本鬼子。他们向离我家五户的一家冲进去抓人,结果扑了个空。过一会儿,又冲进去找孩子,又扑了个空。敌人穷凶极恶,把屋里的家具打得稀巴烂,把大门也砸了,还要烧房子。苏南农村,都是木结构的住房,十多户连排建房,一家失火,可把十多户都烧了。大家找保长、乡长做工作,总算没烧房。原来,日本鬼子是来抓共产党的,但未抓到。鬼子来前几分钟,一位同志前来报信,夫妻二人从后门匆匆走了。跑到后面一条街巷躲起来,可是吃奶的儿子没来得及抱走,留在房间里摇篮内,要回去已来不及了。本家一位十来岁的小姑娘自告奋勇,从后门跑进去,把小男孩抱了出来。伪军看见小姑娘抱个小孩子在场地上走动,也不以为怪。小姑娘的勇敢、好心为全村人称赞。日本鬼子抢粮和抓共产党人这两件事告诉我,家乡的农民是爱国的,共命运的,可爱可敬的。

我小学毕业后,因为贫穷,无力上中学。而我父亲因我自小瘦弱,希望我走出农村。父亲特别希望我当个小学教师,因此想方设法让我继续读书。当时,长安乡的社会名流,在长安中心小学办了一所初中,由于未获当时政府批准,办了几年也只有初一年级,仅一个教室,各门课教师全由小学老师担任,学生全部走读。长安初中离我家不足三里路。于

是，父母亲让我到长安初中读书。每学期一石大米学费。1949年上半年是初一下学期，正当春荒，我无钱交学费，受到体育老师当众责骂，几乎被责令退学，幸亏我同村的老师胡大公用他的工资为我交学费，在麦收后用麦子交给他算工资。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后来我知道那位体育老师是“三青团”骨干，胡大公老师是共产党员。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读了初一以后怎么办？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无锡。我们解放了，二哥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很快，中共无锡县委、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长安中学，拨给教育经费。于是，我就靠助学金读完了初中，成为长安中学第一届毕业生。

长安中学的校长孟振民，原是长安中心小学的校长；解放后，长安中学正式成立后，就专任长安中学校长。他专心致志创办长安中学，艰苦创业，热爱学生，同学们热爱他、尊敬他。学生们工作后还去看望他。

解放后，我于1949年9月20日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候补期三个月。1949年12月20日转为正式团员。入团志愿书上全由中共张村区委盖章。我当了学生会干部，积极参加了征粮工作。1951年冬天我参加了长安乡土改工作，被评为二等功。土地改革中，我家的一亩半租田变成了自田，又分进两亩半水田和0.6亩桑田，合计分进3.85亩。当时无锡县人均一亩田。我家和几户积极分子自报中农。结果全村大部分农户都成为中农。许多农民批评我们说：